

# 乱世文人:从林白水之死看近代报人的职业化困境

阳海洪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8)

**摘要:**林白水之死是中国新闻史的重大历史事件。从政治的层面来解读这个事件,权力对新闻进行强干涉的专制政体是新闻自由的最大敌人,但如将此事件转换为职业新闻人的个案来解读,以此审视中国近代报人的职业化困境,通过对林白水作为新闻人的职业生存状况的分析,会发现“不善经营”、“传统积淀”、“心理矛盾”是中国新闻专业主义难以产生的原因。林白水之死,是一个乱世文人的悲剧。

**关键词:**林白水;乱世文人;新闻职业化

林白水(1874~1926年),原名獬,又名万里,字少泉,号宣樊,使用过笔名“白话道人”、“退室学者”等,福建闽县人。1926年8月6日,林白水因在《社会日报》上发表《官僚之运气》,得罪了直系军阀张宗昌的红人潘复,被枪杀于北京天桥,以身殉报,时年52岁。

林白水之死,是中国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这个事件的解读,既往的研究多从政治层面着手。诚然,权力对新闻进行强干涉的专制政体是新闻自由的最大敌人。知识分子把西方的新闻媒介、新闻思想引进中国时,他们面临一个深刻的矛盾:黑暗政治迫切需要公共独立的新闻事业来“消毒”和“清污”,而公共、独立的新闻事业又会与其产生尖锐的对立与冲突。黑暗政治与专制政体注定了中国新闻事业职业化的艰难。报业职业化的集中体现是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指报业能够自成一体,专业化、规范化地发展,报纸能够自由地、中立地发表新闻和评论。笔者在这里,旨在透过对林白水这个民国时期著名的新闻人的考察,将既往的政治解读转换为职业新闻人的个案来解读,审视中国近代报人的职业化困境,或许能传递出一些历史的密码。

## 一 不善经营导致的经济依附对新闻独立的损害

经济独立是新闻职业化的前提,当新闻成为全日制职业,但却无法获得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时,新闻职业化只是一个梦想。中国近代报纸环境恶劣,生存竭蹶艰难,“诤者、咒者、谋禁锢其人者、议封闭其报馆停止其刊行者,百计以绝其经济之途,千

方以遏其销售之路。妨害其生命,污毁其名誉。使此一纸之行,如陷泥淖,如困重围,如入孤墓,如航断港”。<sup>[1]1726</sup>“办报非经济自立,则言论记载难于自由;即使苟且敷衍,亦不能广其销路。然经济独立,言之非艰,行之维艰。”“各国对于报纸,多方维护。而中国政府,邮电两项,摧残舆论,至于此极,良深浩叹,此办报困难之又一原因也。各省军阀专权,每假戒严之名,检查邮电,对于访员,威胁利诱,甚至借案诬陷,无恶不作……”<sup>[2]178-179</sup>

除此大环境外,林白水本身不善经营,亦是造成报纸难以独立、职业意识难以确立的重要原因。《社会日报》于1922年5月1日创刊于工商业并不发达的北京,对开四版。当日头版刊登了《本报启事》,说明此报是继《新社会报》停刊后再出版,为答谢读者,价格优惠,以前定价是每月6毛,现在减售4毛,零售每报铜元2枚,这个价格的确便宜,天津《大公报》1919年的零售价是每份铜元4枚,订价每月7角;到1924年,零售价涨至铜元6枚,也就是说,同时期的《大公报》的比《社会日报》零售价贵一倍。

从广告版面来看,这时的《社会日报》每天仅有25%的篇幅是广告版(头版上有半版,四版有半版),而《大公报》有50%左右的篇幅是广告。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多数中国报纸上的广告篇幅占报纸总版面的50%-60%,相较这个数字而言,《社会日报》的广告是比较少的。当时的一些报纸,如《大公报》,还经营印刷业、图书出版业等,但从《社会日

收稿日期:2009-03-13

作者简介:阳海洪,男,湖南冷水江人,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新闻史论与媒介批评。

报》所刊登的启事中,没有找到能证明其还经营其他副业的证据。<sup>[3]</sup>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社会日报》篇幅少,售价低,广告少,收入不会很高,可以说是惨淡经营。这点林白水本人就有所说明,1925年7月3日起,林白水曾在《社会日报》副刊每期刊载《林白水卖文字办报》的广告:“《社会日报》自出世以迄今日,已满三年,耗自己之心血,不知几斗;糜朋友之金钱,不知几万。艰难缔造,为社会留此公共言论机关,为平民作一发抒意见代表,触忌讳,冒艰险,所不敢辞。然为资力所扼,发展无望,愧对读者……计不得已,惟有出卖其自以为能之文与字,借资全活。”<sup>[4]</sup><sup>1777</sup>

林白水是一个有正义感的近代文人,对现实的黑暗政治有着强烈的发言欲望。独立经营自己的报纸、以报纸作为社会的公共言论机关一直是他的梦想,他也为此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十年春,遇周子虞君于潘氏之居,叩所志,以办报对。”<sup>[1]</sup><sup>1726</sup>但这种经济困境深刻地影响到了林白水的职业生活方式,为了维持报纸的运营,林白水采取了多种方式来弥补办报的亏损。

一是依附于政党或者权势人物办报。如《公言报》依附于安福系,其办报资金就来自于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同时也接受政府津贴。当时担任财政次长、总长的李思浩回忆,对《新社会报》“要给以相当数目的资助”。有资料表明,1925年,北京政府曾以宣传费名义向全国125家通讯社发津贴,林的《社会日报》以超等者的等级,每月至少可津贴300元。<sup>[5]</sup>二是亲友资助。据林的女儿林慰君回忆,在办报艰难之时,林白水的妹妹林宗素曾几次给以帮助。<sup>[6]</sup><sup>1103</sup>三是卖文字甚至典当家产办报。当时上海报纸都以刊林白水的文章为荣,林白水才思敏捷,现代出版事业的发达为其提供了用武之地。四是利用内幕新闻敲竹杠。尽管林白水对此现象深恶痛绝,曾撰文予以批评,<sup>[7]</sup><sup>591-592</sup>但林氏亦是此中老手,“给钱就不骂,决不恭维。”<sup>[5]</sup>

接受政府津贴、利用内幕新闻敲竹杠、依附政党或权势人物,在很大程度上,林白水的职业生存是一种依附式生存。新闻能作为独立职业与经济独立是紧密相关的,经济的依赖性成为中国报业职业化的“紧箍咒”。依附生存却追求言论独立,与暴政携手却想占有道德高地,林氏之死于此可见端倪。

## 二 士大夫情结与职业报人理性精神的冲突

王韬创办《循环日报》,以自己的办报实践,“开

启了在科举功名之外的另一条新道路,树立起了一种新的人生模式,称之为近代中国最早知识分子应该是恰当的。他不依傍朝廷,独立创造自己的事业,报刊这个舶来品,正是在他手里完成了最初的中国化过程,他把古老的农业文明传统和西方工商业文明的理想结合在一起,借助报纸这一新型载体,发出了独立的民间的声音,成为百年言论史的源头,影响深远,余音不绝。”<sup>[8]</sup>他改变了古代文人读书致仕、服务皇权的人生模式,一种新型文人生活方式——职业报人——逐渐进入了知识分子的视野。

新闻的发展需要一大批职业化的新闻从业人员,当时的中国新闻教育事业尚未起步,从业人员只好从一些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以及曾经有过办报阅历的人员中分化出来,成为专业的记者、编辑和办报人。林白水本身的人身阅历与知识结构使其成为其中的杰出代表。但这些其他行业分化而来的新闻人,身上还有着浓厚的士大夫情结,其对新闻的认知,往往从传统文人而非职业新闻人的角度来审视。简言之,在新闻业的发展迫切需要职业化的新闻人的时候,传统的文化积淀拖住了新闻人转化的步履。在那篇带来杀身之祸的评论《官僚之运气》中,林如此来描述他的评论对象:“某君者,人皆号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袴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之累赘,终日悬于袴间也。”<sup>[9]</sup><sup>1179</sup>评论中所指的“某君”即是潘复,阴险毒辣,号称张宗昌的“智囊”。这里,林白水故意用“肾囊”和“智囊”在字形上的相似性、“肾囊”和潘复的字“馨航”在读音上的相似性来影射时任北京政府财政次长的潘复,把潘复和张宗昌的关系比喻为“系于袴下之肾囊”。不难看出,林白水对张宗昌和潘复等人的攻击已经涉嫌人格侮辱,这反映了林白水认为报人一旦占有道德高地,便以为舆权在握,可以放言高论的“无冕之王”意识,也是更加令当事人难看和嫉恨的原因。该评论的当事人潘复当晚从《社会日报》上看到《官僚之运气》这篇文章时,勃然大怒,要求林氏在报纸上刊出更正声明,并且公开道歉,林以“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为由断然予以拒绝。潘复哭诉于张宗昌面前,最后招致林的杀身之祸。

报纸批评时事,臧否人物,它所追求的是一种理性的战斗精神,用鲁迅先生的话讲,“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林的时评在对潘复冷嘲热讽,进行丑化和矮化,其政治的激愤是通过道德伦理的角度来表现出来的,认为个人道德修养在政治行为中起着

决定作用,传媒成为“道德审判法庭”,确如当时有人所评价的:“议论个人长短,或揭人隐事,涉及权贵私德问题,形容备至,不留余地。”<sup>[5]</sup>同样的评论还能在其他的新闻和评论中看到,如在1923年2月28日刊出的《吴大头之进项》中,给当时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取绰号为“吴大头”,因其为吴三桂后代而称其一门为“塞外的流氓,关东的蛮种”;1923年6月,在《国民还要猪仔表么》《赶猪运动》等新闻报道中将那些受贿的议员痛斥为“猪仔”,国会称之为“猪仔国会”。从这些词语的选择,我们可以感觉到林白水对当时政治的愤激,为其赢得了“新闻界刽子手”的称号。但这种人身攻击,已经偏离了新闻评论的理性精神,是以文人笔法来写新闻评论,这种现象的产生,既有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理论支撑,又是中国古代文人清议传统和名士风流的流传。考古学家容庚曾在林白水家做过家庭教师,在他眼里,林白水酷似东汉末年击鼓骂曹的狂士祢衡:“视权贵蔑如也。其所办日报,抨击军阀,笔锋犀利,如挝渔阳之鼓……其身世与祢正平略同。”<sup>[10]</sup>近身观察,锐眼独具,正是看到了林身上的名士、狂士特征。

这种评价角度,通常表现为对个人德行的注重,与对实际政治运作的漠视。政治道德化的文人批评视角,往往导致对真正的政治问题视而不见,综观林氏的评论,往往纠缠于具体的政治人物和事件,缺少建设精神,并且好于给所批评的人物取外号,对其进行人身攻击,无法再做进一步的提升,尽管对当时政治不无少补,但并没有太大的作用。根据林慰君的回忆,林白水可能是中国最早学习新闻学的人,<sup>[6]</sup><sup>[9]</sup>但这种新闻评论中的名士风范,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精神是相悖的,这里隐藏着中国新闻职业化进程中一个关键问题,即如威伦斯基所说的新闻形成职业所必须的新闻法制和新闻伦理的阙如。林氏强调“新闻自由不容暴力干涉”,但没有边界的“新闻自由”往往会沦为“语言暴力”,对社会进行强干涉,最终会戕害新闻自由。这种情况在实行言论自由的西方国家尤其是早期的英美国家也并不罕见,但并不会因此而遭受极刑,林白水的遇害,说明了当时新闻人生存的艰难。在一个没有规则,缺乏秩序的媒介生存空间里,语言暴力与政治暴力艰难互动,危险无时不在。

### 三 传统文人意识下政治与新闻之间的矛盾与摇摆

许纪霖在对张君勱和黄炎培这两个知识分子的

政治历程的研究中,发现了一组隐藏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的悖论:入世与出世、改制与启蒙、统一与民主、独立与依存、超然与介入、正义与生存……并且认为,正是这一系列的心理悖论,导致了近代知识分子在人生选择上的反复摇摆,很难确定自己真正的立足根基。<sup>[11]</sup><sup>[305]</sup>

这种心理悖论,在林白水身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仔细观察林白水的一生,自学业有成,走向社会开始,所参与的工作主要为三项:办报、教育与从政。尽管新闻事业进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以来有机会实现与大一统政治的人身决裂,赢得了创造知识文化为职业标记的独立社会身份,知识分子自我价值的实现,不必向外投射于政治,而可以向内谋求于新闻事业本身,将职业作为自己的第一生命。林白水绝大部分生命投身于办报,并最终以身殉报,显示了他对新闻事业的忠诚和热爱。然而,中国进入现代的后发外生性特点使得中国的现代转型与民族独立任务相伴而行,正当新闻人的“职业自我”被唤醒的同时,那古老的“政治自我”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显得空前敏感和强化,“使他们震动的不仅仅是意识到面临的危险。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自我发现过程,每一步都要以中国在世界上的不稳定地位这样一个客观形势作对照,来检验中国人的主观思想。”<sup>[12]</sup><sup>[111-112]</sup>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面对东西方的差异,被动地形成了自己的职业意识,确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外在的民族救亡任务迫使中国近代的新闻从业者一身兼“新闻人”和“政治人”的双重角色。并非新闻不能关怀政治,新闻和政治有着天生的血缘,只是它对政治的关怀有着自己特定的职业角度。林白水的悲剧在于:时代赋予他这样的双重使命时,却没有提供相应的历史条件。西报东来为中国舶来了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与职业意识,但是,近代中国尽管其社会职业结构,特别是在对西方新闻职业的认识上已经认同于西方,但其社会权力结构却依然是以官僚政治为轴心的专制布局,使得有责任感的新闻人往往由文人论政一变而为庙堂问政,通过直接参与政治来改良社会,在这里,办报虽然是近代知识分子一种新的职业,但是,这种职业的更新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报人作为知识分子固有的劣根性。从林白水一生的参政活动来看,入同盟会,入共和党,入“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张目,投靠安福系,其动机不乏这样的因素,当然,投机的因素也不能排除,只是在他意识到袁政府与他的理想相背离时,他才抽身而退,回到新闻事业中来,重返新闻事业是他政治

受挫之后的选择。

在政治与新闻之间的反复心理摇摆,或者如某些论者所说的“曹汉现象”,<sup>[13]</sup>是近代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心理通病。这种心理矛盾的产生,既有传统“学而优则仕”的影响,更有现实中国处境的触动,民族国家意识既是他办报的动因,也是他在教育、新闻、从政之间摇摆而难以确定自己新闻职业意识的原因,而无法树立起清醒的职业精神,即使在他生命的后期,倾其心血来办报,也始终与现实政治牵连得太紧,可以这样说,终林白水一生,他的视线都没有从这个焦点上转移,新闻是他表达自己政治关切的工具,那种新闻专业意识与其相比,色彩显得暗淡,尽管他也报道过一些社会新闻,但这种报道社会新闻的视角,依然是政治的。如当时人所评论的,“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其见诸报章,每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于政局,针针见血,物无遁形。”<sup>[5]</sup>林白水的从政经历使他在政界有着深厚的人脉资源,在新闻界的影响亦使他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会不会由于自己的“舆论领袖”地位和上层政治的交往使林白水大意地忽略了可能遭遇的危险。在此之前,林有过五封报馆、三入牢狱的经历,他都能全身而退,由于目前史料的阙如,我们已经无由猜测了。不过,当新闻越过边界对政治实行了强干涉的时候,政治对新闻的强干涉就为期不远了。

透过林白水之死的职业悲剧,历史显示出了上述的密码。本文的结论是:尽管作为“民国时期最具胆魄和血性的报人”,<sup>[10]</sup>林白水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新闻人之一,他的嫉恶如仇、耿直刚正都是后人学习的典范。在林白水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人向职业报人转化的艰难步履,但这个转变还远没有完成,林的生存方式,是一种乱世文人式的生存,而非一种职业新闻人的生存,他的悲剧亦是一个乱世文人的悲剧,而非一个职业新闻人的悲剧。首先他是乱世的生存,当时中国封建专制走到尽头,民主共和正在兴起,新旧交替,社会乱象纷呈,这种乱世,政治黑暗,军阀擅权,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状况下,作为职业的新闻人很难生存;其次他是文人式生存,尽管林白水是中国最早学习新闻专业的知识分子,但毋庸置疑的是,他的思维还是文人式的思维。世愈乱而言益起,黑暗政治为新闻人提供了议政问政的道德高地,狂士式的放言无忌却为政治的强行干涉提供了进入路径,法外的“社会”与新闻外的“文人”,所有这些,都很难使他完成职业化的蜕变。因此,“近代中国报界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独

立报人难以培养,独立舆论无从出现,但是有两类报人为数颇众:一种是唯唯诺诺的奴才型报人……再一类是以破坏为职业的狂徒。”无论奴才记者还是狂徒报人,都是独立报人难以产生的变异。这两种报人的众多,也抑制了独立报人的出现。这正是近代中国报人的悲剧,近代中国人的悲剧”。<sup>[14]</sup>奴才型报人所表现出的是权利意识的缺失和对权力的崇拜,狂徒型报人所表现出则是对职业规范的蔑视践踏的反制度心理,二者内在统一地构成专制政治控制下培育而成的一种制度伦理,成为中国新闻事业职业化进程中最难克服的障碍之一。由是观之,林白水的新闻职业生存所显示的——“政治”和“新闻”、“依附”和“独立”之间——摇摆就具有了丰富的历史意味。

#### 参考文献:

- [1] 林白水. 一千号 [M] / 林伟功. 林白水文集·下卷. 福州:福建省历史名人研究会林白水分会刊行, 2006
- [2] 汪汉溪. 新闻事业困难之原因 [M] / 张之华. 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 [3] 陈彤旭. 读解林白水 1922年的北京办报生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J]. 纪念中国报界先驱林白水烈士就义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未刊稿.
- [4] 林白水. 林白水卖文字办报 [M] / 林伟功. 林白水文集:下卷. 福建省历史名人研究会林白水分会刊行, 2006
- [5] 傅国涌. 一代报人林白水之死 [J]. 文史精华, 2004(4).
- [6] 林慰君. 我的父亲林白水 [M] / 福州:福建历史名人研究会林白水分会. 纪念林白水文集, 1998
- [7] 林白水. 竹杠教科书 [M] / 林伟功. 林白水文集:下卷. 福州:福建省历史名人研究会林白水分会刊行, 2006
- [8] 傅国涌. 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前言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9] 林白水. 官僚之运气 [M] / 林伟功. 林白水文集:下卷. 福州:福建省历史名人研究会林白水分会刊行, 2006
- [10] 王开林. 千秋白水文章 [J]. 书屋, 2005(8).
- [11] 许纪霖. 无穷的困惑:两个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涯 [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88
- [12] [美] 格里德尔. 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 [M]. 单正平, 译.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2
- [13] 吴廷俊, 肖志锋. 中西近代报人“曹汉现象”比较 [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 2006(4).
- [14] 谢国明. 试论近代中国报人的悲剧 [EB/OL]. <http://www.kongfz.com/blog/blog.php?do=showone&tid=15111m>.

(责任编辑:黄声波)